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Mc
Graw
Hill Education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瑞典] 麦茨·埃尔弗森 著

甘会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瑞典】麦茨·埃尔弗森 著

甘会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瑞典)埃尔弗森
(Alvesson, M.) 著;甘会斌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1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书名原文: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ISBN 978 - 7 - 208 - 09807 - 7

I. ①后… II. ①埃…②甘… III. ①后现代主义—
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197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林凡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社会学、人类学译丛 ·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瑞典] 麦茨·埃尔弗森 著

甘会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5 插页 3 字数 233,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807 - 7/C · 377

定价 28.00 元

前言

社会科学中很少有什么思潮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对从事研究的人影响巨大。在有些人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关系到我们认识晚期现代或后现代世界的一种革命性立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则是一种威胁,威胁到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者对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主张,以及提供有关社会实在本质的确定陈述的可能性,都持有一种自觉的批判和怀疑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也似乎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社会研究发展前景的环境……

在这一背景下,埃尔弗森发现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洞识是有启发性的,却又不愿坚持对知识主张的否定态度——那是诸多后现代著述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这么来写作本书的。事实上,他在质性研究里发现了很多与后现代的敏感性相吻合的东西。大体说来,质性研究的后现代取向被展现出来的主要方式,正是凭借它对人种志研究者和其他人所生产的那些“发现”的批判姿态。后现代主义者不把这些报告看作是提供了知识或见识,而往往认为它们不过是些书面叙述,其主张和策略尚需拷问。埃尔弗森考察了以质性研究的后现代取向进行思考的这一方面,而又远不止于此。

他特别检视了后现代主义对质性研究实践的意涵。这是大多数在某种后现代传统里耕耘的作者都唯恐涉足的一个领域。于是,谦卑的访谈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受到仔细审查,这种方法既可以由后现代观点加以阐明,也可以根据后现代观点进行修正。他的取向本质上是采取了有所选择的立场的一种,在这一立场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要义在质性研究架构内被利用起来。他也聚焦于后现代主义者萦绕于心的那些核心论题,比如认同的观念,以此表明,他在本书中概述的受后现代主义启发的质性研究策略也可以通晓它们。

这是对后现代主义领域和质性研究领域迅猛增长的文献的一大贡献,但是单凭这本书敢于思索众多作者以为有害于研究实践的一种立场对社会研究活动的意义,它也是一本独具一格的书。

艾伦·布里曼(Alan Bryman)

序

初步介绍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清晰、简洁、浅显易懂、逻辑性强,这些评价教科书时一般会受到赞扬的东西,却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们所赞美的。

我个人对后现代主义感情很复杂。我不太喜欢这个标签。不过我确实认为,在这一旗号下的所思所言,有许多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它们可能在社会研究中扮演发人深省的、激发创造力的角色。

有时候我很后悔答应写这本教科书,因为要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并应用于社会研究领域,实在很困难。但愿这本教科书能完成我想让它做到的事,即促进这样一些社会研究方式的发展,它们吸纳了从宽泛地界定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仔细撷采来的奇思妙想。而且为了这么做,我在游走于哲学内容与有待研究的环境所提供的凌乱的经验材料——抑或说是被归于环境的经验材料——之间时,既不要琐碎,也不要表现出矛盾,淆乱了立场。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我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是以破除理论和方法间的分裂,使方法问题少一点按部就班的、技术性的色彩,多一点思想和理论的色彩为志向,来撰写和重写质性研究方法。我认为透过这样一个计划,社会探究中的创造力和解释的敏锐性都能得到提升。迄今为止,我与合作者一道,已经写了几种教科书,分别是关于反思性方法学(Alvesson and Sköldbberg 2000)、批判研究(Alvesson and Deetz 2000)、话语分析(Alvesson and Kärreman 2000)、反思性访谈(Alvesson 2001)和多重阐释(Alvesson 1996)的。这些方法论思想在各种经验研究项目中被实践和例示着。

本书各章利用了不少旧作,但在这本书里对之做了全面修订。第二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15, No. 6, 1995)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和无意义”为基础的。第三章从“组织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取向”[与 S. Deetz 合写,载于 S. Clegg、C. Hardy 与 W. Nord 合编的《组织研究指南》(*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Sage, 1996)]中借用了一些材料。第四章是“预流语言学转向”[与 D. Kärreman 合写,载于《应用行为科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6, No. 2, 2000)]的修订版。第五章在较小程度上利用了埃尔弗森(M. Alvesson)与比林(Y. D. Billing)合作出版的教科书《理解性别与组织》(*Understanding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Sage, 1997)。第六章多少有些运用了《超越新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工作底稿)中的材料。第八章第一节是《美好的远景,拙劣的微观管理,丑陋的暧昧不明:知识密集型公司(非)领导者的矛盾》的概要,那是提交给“第三届牛津知识密集型企业专题研讨会”(牛津大学,2001年9月)的论文(与 Stefan Sveningsson 合写)。本书的多数正文都是初版资料。

非常感谢各种项目里我的合作者们——伊凡·比林(Yvonne Billing)、斯坦·迪茨(Stan Deetz)、但·卡雷曼(Dan Kärreman)和斯特凡·斯维宁森(Stefan Sveningsson)——允许本书使用联合著作,说远一点,也要感谢他们这些年来的出色协作关系。

我也感谢艾伦·布里曼、罗伯特·格拉夫顿-斯莫尔(Robert Grafton-Small)、诺曼·杰克森(Norman Jackson)、伊凡·比林和斯特凡·斯维宁森给本书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另外还要感谢艾伦·布里曼和开放大学出版社,是他们邀请我写作此书,并十二分耐心地等我交稿。

最后,我愿谢谢我的家人——伊凡(Yvonne)、米哈(Miha)和玛塞尔达(Mathilda)——的支持与耐心。

麦茨·埃尔弗森
于瑞典隆德

目 录

前言 1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 愈演愈烈的方法批判与经验工作的观念 3
- 社会研究中的理性的限制 5
- 后现代主义:初步“描述” 10
- “后现代主义”标签的一些问题:初步的微词 12
- 慎重联系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研究 13
- 全书通观 15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怀疑性的概观 18

- 后现代主义的界定困难 19
- 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 21
- 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性 21
- 作为一种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27
-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30
- 特定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组织研究 31
- 选择:“外在于那里”的后现代时期,还是后现代哲学? 35
-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 36
- 结论 43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论题 46

- 话语的中心地位 47
- 分裂的认同 49
- 表征思想批判 51
- 基础和主导叙事的丧失 53
- 知识—权力关联 55
- 推论:作为抵抗的研究与不确定性 57

2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

小结 60

第四章 正视语言 62

引言 63

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65

后现代主义与话语分析 66

话语分析、语言使用和意义 68

社会研究中方案选择的重建 71

对社会研究实践的蕴意 75

聚焦语言或以语言为指示符 78

一个案例:广告人中间的认同工作(identity work) 82

结论 85

第五章 揭蔽范畴 88

陌生化 90

论性别的社会建构和解构:超越男人和女人 91

性别的陌生化 95

对后现代主义性别思想的批评 97

对研究实践的意义 99

小结 101

第六章 后现代主义与访谈 105

有关访谈的主要立场:新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 106

最新发展:温和的怀疑? 108

访谈研究一例:解释的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109

重新思考访谈: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110

方法论意涵 115

一个示例 120

结论 122

第七章 解释与书写 125

声音 126

解释 128

书写 131

总结:受后现代主义启发的研究工作的两难 138

第八章 选择性运用后现代思想:一个例说 141

案例:公司里的领导乎? 非领导乎? 143

评论 147

小结 156

第九章 结论 158

有效性——或决定好坏的其他标准 159

在模式与模糊、建序与不可判定之间游走 165

反身性 167

总结:选择性后现代主义化 168

术语表 173

推荐进一步阅读书目 176

参考文献 179

索引 195

第一章 绪 论

1

本章概要

愈演愈烈的方法批判与经验工作的观念

社会研究中的理性的限制

后现代主义:初步“描述”

“后现代主义”标签的一些问题:初步的微词

慎重联系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研究

全书通观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这个短语，不是人们经常会碰到的。实际上，按照习以为常的理解，多数人也许会将后现代主义与对“社会研究”的观念之缺乏兴趣甚至是对它的直率的怀疑论联系在一起。社会研究被设想成是凭借经验探索，去发现事物在社会中是怎样“外在于那里”的。而后现代主义，至少就多数人所写所谈的来看，却表现出许多批判性反应。“发现”不是后现代主义要做的事；“事物是怎样的”暗示了一种真理断定，其中，世界的某种秩序建构受到偏爱，目的是以此规训主体，使他们的反应定型；社会不被承认为一个客体或经验环境，而被视为一种建构，是由各种职业共同体（和其他群体）杜撰的；对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经验探究可能被看作一种修辞工具，用来赋予所提及的真理主张的形成以合法性，在这一修辞里，某种特定词汇被独断地呈现为优越于别的词汇。社会研究中的“社会性”（the social）也会在后现代主义的鼓吹者中间引发怀疑和抵制，他们坚定地强调，语言和文本是唯一可能的关注目标，“社会性”在此并不真的合适。

正如罗斯诺（Rosenau 1992:1）所写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 从对立的角度看，对社会研究有兴趣的普通人，对这样一种思想取向会觉得兴味索然或不能容忍：它把社会研究力图完成的一切全变得问题重重，又不提供任何显明的建设性建议。在本书的可怜作者眼里，这些思想方法的处境因而显得阴沉晦暗，在他（就是在下）敲打键盘写作这本教科书期间，不止一次地困惑不解：他怎么会陷进这个棘手的境地。“使命：不可能”——带上或不带问号——或许本该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概读者开始担心了，是否值得花这金钱和时间买这本书，读这本书。

就让读者怀着一点不安，怀着这个疑问——怎么写出一本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的教科书，而不给人题目中的两部分根本无关甚至彼此对立的印象，且让我先谈谈关于我们如何能够理解社会现象的两个交叠的当代思想背景。

* 参见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本书的脚注为译者注，篇后注为原注）。

愈演愈烈的方法批判与经验工作的观念

多数形式的社会科学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依然是非常强烈地以经验研究为导向。但何谓“经验研究”恰恰是不明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要是细究起来,一切都是不明确的,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不去操心这个)。不久前,“经验的”研究常常意味着,人们假定有个独立的现实外在于那里,可以通过这一现实的种种迹象即资料来感知和测度它。透过精心的程序设计,基于该设计的资料收集和加工,以及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经验研究能够判断与志在研究的大量现实相关的各种假设的是非。如今,在很多阵营看来,赞成部分社会科学中的这种观念就显得老套、褊狭,理论上哲学上都太简陋。实证主义——现在界定得很宽泛——这个标签招致形形色色的贬抑的评论。最近就何物构成了经验研究的问题,观点杂陈,使这种研究活动的意义暧昧不明。例如,对有些人来说,解读各种文本或许就是经验研究。

然而一般地说,“经验研究”指的是热衷于收集或编排经验材料,这些材料说明了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科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收集”、加工资料来判断各种假说和理论的是非的可能性存有疑虑,可即使是他们,也依然经常对经验工作兴致勃勃。在很多形式的质性研究如扎根理论里,所持的预设就是,精心加工过的资料能够指导研究者去理解特定现象并发展理论(Glaser and Strauss 1967; Strauss and Corbin 1994)¹。解释性(interpretive)工作通常假定,我们能够从被视为社会共同体关键要素的意义与符号互动的征象中接近和研究社会现实。 3

把资料和经验探究当作知识发展基石的这一重要信念,近些年来受到大量思想趋向的质疑。我将只是简略指出其中一些趋向。也许可称之为“非客观的”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t)诸视角,就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这些视角强调前理解、范式和修辞如何预先组织了我们对打算研究的东西的基本概念化。我们对经验到的东西的取径、感知和解释,经过了预设、期望和词汇之网的过滤,后者指导着整个研究规划,对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关键(如 Brown 1977)。

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判,她们指出了男人统治与男性标准对社会科学的主流知识论和方法学的影响(Jaggar 1989)。男人统治造成一种男性化的社会科学,它围绕着诸如客观、中立、距离、控制、理性和抽象等理想建设而成。可堪替代的理想,如参与、移情、亲近、合作、直觉和具体等,都被边缘化了。因而科学理性是在表达男人统治,而不是什么优越理智。如果谁

考虑一下研究者心理学和不同群体间的冲突,那么学者冷静地、合理地以客观真理为依归的这种观念,就显得很奇特了(Popper 1976; Bärmark 1984)。批判理论家表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看法,他们强调社会研究的政治性与利益关涉、价值关涉的性质(Kincheloe and McLaren 1994; Alvesson and Deetz 2000)。据说,知识发展建基于人类旨趣(Habermas 1972)。在社会科学里,如果不就社会的构成做出一些暗示,要说出什么东西有社会意义是不可能的——社会科学人所共知地是政治性的。人类旨趣与文化的、性别化的、政治的理想在方法论理想及研究实践和结果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很难把科学看成一项纯粹的活动,相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制度和旨趣的再生产或质难是中立客观的。

4 话语主义者(discursivists)和建构主义者提出了甚至更为深刻的观点,他们否认科学有任何特权的门径,可以通往关于语言和语言运用之外的社会世界的客观真理(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Steier 1991)。他们认为,语言建构了而非反映了现象,这使再现、因而使经验工作根本上是成问题的事业(Gergen and Gergen 1991)。“外在于那里”(如行为)或“内在于那里”(如情感或动机)而(可能)存在着的,是复杂而模糊的,永远不能完全捕捉到,但是给定视角、语汇和选定的解释,“现实”就会以特定方式浮现出来。任何一项对真理的宣称,所表达的研究者的信念和语言运用,与对研究对象的表现,不差分毫,甚至更多。福柯(Foucault 1980)也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广义地说),他声称,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权力紧密相连(通过制度安排和建序策略规整社会现实),与其说它在探索或歪曲事实,毋宁说是创造事实。这样的断言越来越普遍:“没有朝向一个人内心生活的明亮畅通的窗户。任何凝视总主要由语言、性别、社会阶层、种族和族群这些透镜加以过滤。不存在客观的观察,只有社会性地定位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那些世界的观察。”(Denzin and Lincoln 1994:12)

这样大规模地批判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却并不妨碍多数研究者有些若无其事地继续从事常规科学。问卷法研究者依然假定,回答者在小方格子里标出的各种选择,使我们有可能确定社会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质性研究者依旧在呈示访谈陈述,仿佛这些陈述是通往受访者内心世界的大道,或者是社会实践的真实写照,虽然大家——也包括实证主义者——广泛承认,资料需要解释才能说明什么。这种批判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太绝对,太有挑衅性,让人觉得是破坏性的,因而不予理睬。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批判谈的多是哲学的或知识论的论题,而做研究的技艺——比如田野工作——就注意得很不够。后者主要被当成是技术问题,至少在多数教科书和研究报告中,它们有别于关

于知识生产的理论和哲学思想,虽然在这一点上正在出现某些改变。方法,即涉及如何生产和理解经验材料的、与操作相关的原理和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不受那些跟我们理解方法论实践息息相关的所有成果的影响。开发知识上存在诸般问题,作为一种理性规划的社会科学也有种种局限,关乎此的大量洞识都需要同研究实践结合起来。许多研究者感到这一切的哲学作品意义不大(如 Melia 1997)。我认为挑战在于怎样尽力把它们某些部分融合到研究实践当中去。对社会研究的这种多样而又急剧膨胀的批判,及其对从事田野工作、解释和写作的具体方法的不确定的适用性,构成了本书的一个语境。

社会研究中的理性的限制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位人类学教授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学生向他请教,问自己应该用什么范式,结果学生得到的答复是:“到外边去,发现原住民在干什么。”这可能听起来像是真心话,许多质性研究者似乎认为,只要有一颗不带先入之见的头脑,有某些个人品质(移情、好奇、开放),有一种强大的方法学和一个记事本,好研究就能做出来了。对这种观念进行的理论和哲学的批判,前已简评过,兹不赘述,让我就发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给出一些提示吧。

设想一项研究,比如说从某国来的移民,住在某市,靠社会福利局维持生活,现在要研究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感受和态度?跟当局的代表打交道有什么体验?等等。不妨假设研究者是在完成博士学位的项目,或者受到研究基金资助,她有两年时间可供支配,半年时间用在田野工作,一年半时间用于分析资料和写作报告。也许要花几周时间跟市政当局和估计对这项研究兴趣极大的那些人建立起熟识关系。几周时间观察,还有比如说 30 次访谈,每次访谈一两个钟头,然后这些就构成经验材料的主要部分。细心地做笔记,详尽地转录(transcription),制作出大约 200 页观察笔记和 400 页访谈抄本。如果这是合格地完成的,人们可能料想,关于该主题的可靠知识就生产出来了,随之而来的一篇研究报告或博士论文就能权威地、可信地告诉我们许多知识,让我们了解被研究群体如何看待他们所在市的社会福利局。但是人们也可能怀疑:真是这么回事吗?

图 1.1 简单地说明了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步骤 1 是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把时间花在她觉得是当地社群的相关部分上,观察、访谈。步骤 2 是生产出意在反映事态的 600 页材料。步骤 3 是把这些材料组织编排成某种便于处理的东西,去除掉重复、没有意义、据估计不在研究者兴趣范围内的、或者完全麻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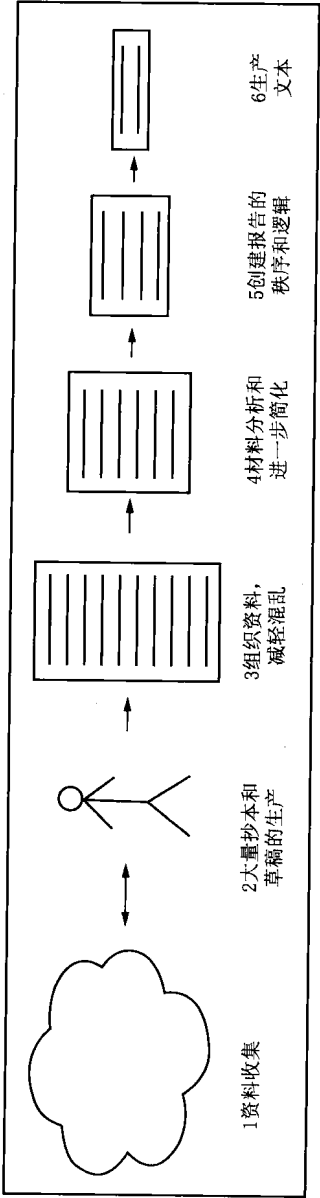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过程简图

劣无用的那些材料,剩下的再归入几大类。步骤4是分析材料,把它进一步简化成比如说150页的东西,研究者可以更精细地加工它,用更细致入微的范畴来解释最初难于理解的意义。步骤5是把这材料整理成特定的逻辑和论证。步骤6是生产出最终报告,其中材料的精选部分发表在经验陈述的比如说三章里,抄本或笔记的20页左右以修订的、简缩的、剪辑的形式复制在那儿。这20页所包含的资料,表明了调查的有效性,使研究者就在现场并以权威姿态谈论该主题这一点显得确实可靠。

在图1.2里我加入了影响——甚至是支配——这一过程的某些“复杂性因素”。其中与初始阶段即“资料收集”阶段相关联的问题有:(a)研究者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的信条,它们多是被视为当然的(按定义,范式就是如此);(b)研究对象的期望、利益和信念;(c)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d)在研究过程中发展范畴和整理材料的种种挣扎。“组织材料”阶段包括(e)大量的解释性工作,涉及如何理解访谈谈话和观察笔记以便形成600页的文本,包括旨在挑拣材料、消除没有意义(即不合研究者的语汇及架构)的东西的各种措施。编纂行为造成材料与其语境的剥离,从而将它转变成不同于它的原初形式的东西。接下来是步骤(f),其中一切都成为审慎分析的目标:这里,与怎样处理材料有关的已确立的学术知识、理论词汇和惯例都用上了,包括在这个过程中要发现一个(或几个)模式的观念。紧接着是撰写结果报告的步骤(g)。这里写作惯例——格式、语言使用、政治正确的期望、行文清晰合理的规范,得出有理有据的结论并尽量权威、有说服力地表述的规范——又取得主导地位,经验材料要模塑得跟它们相符。

这整个过程的合理性高度受限。作为一个例证,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研究者对他们田野工作的笔记五味杂陈,将信将疑。即便研究者在做笔记时要求很高、系统详尽,他们有时也感到笔记没有抓住真正发生的事情。有些人更倚重他们的“脑记”(headnote,记忆)而非田野笔记(写下来的印象),因为前者可能看起来包含了更丰富的、不那么乏味的材料(Wolf 1992; Jackson 1995)。但是由于记忆和事后建构(after-construction)是不确定性和偏见的重要源头,人们可能强调,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如何将田野工作经验转译成记实描述的形式这个问题,从记实描述的形式出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展开。当触及比做笔记甚至更为“主观的”研究成分,如访谈、阐释和写作时,如果考虑到对这种规划的理性主义信仰,那就会冒出更深厚的烦恼之源。

所有这些牵涉到的成分都影响到结果。在研究对象的情感、观点、体验方面,或许“外在于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被明察秋毫地映照、反映或书写出来,这不可能被视若当然。人们会认为,作为最终结果的文本是众多过程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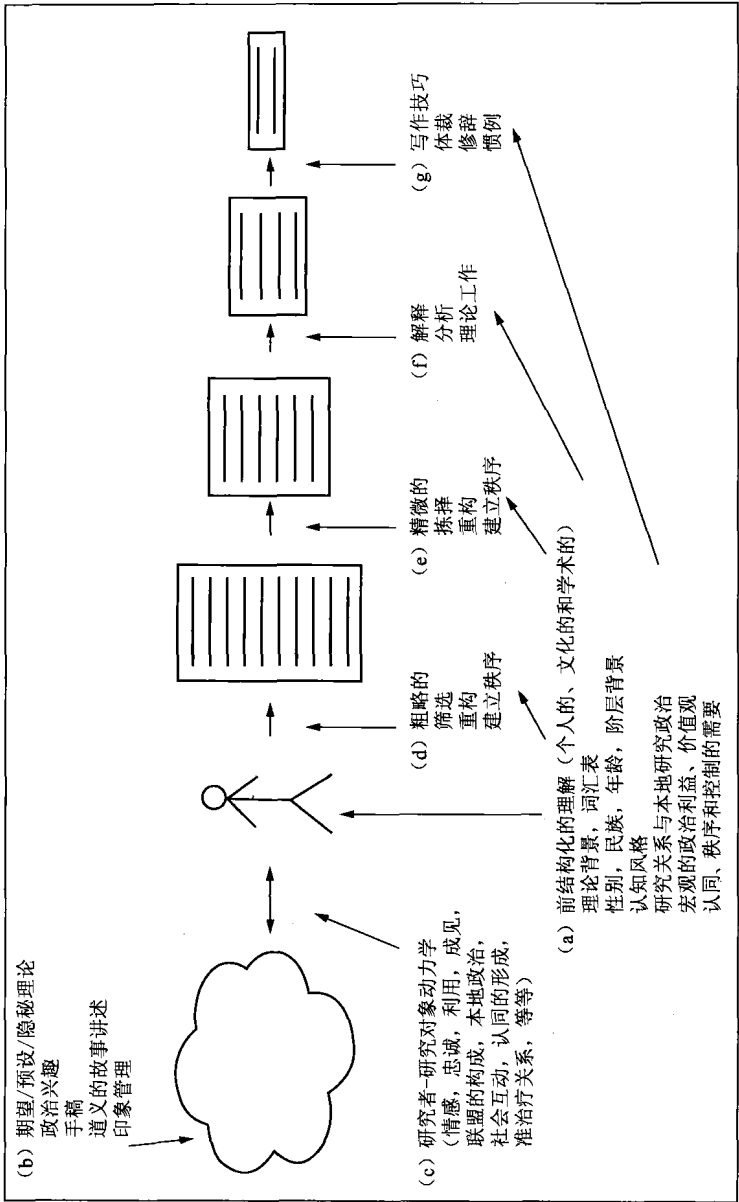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过程详图